

## 目 录

- 云南“五四”运动回忆纪要  
.....杨一波（1）
- 回忆“五四”  
.....杨春洲（4）
- 回忆五四运动的感悟  
.....陈可轩（11）
- 民族英雄项崇周传略  
.....胡兴义（15）
- 记我先祖项崇周  
.....项朝宗（19）
- 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  
.....杨辉远（35）
- 回忆“七·一五”的斗争的片断情况  
.....张世清（57）
- “七·一五”学生运动的松坡中学  
.....夏延算（66）
- 光荣的云南建民中学  
.....卢华泽（72）
- 楚雄中学传播革命思想的人——程果  
.....王尊贤（82）

从牧童到将军——怀念周学义同志

.....王永春（86）

党领导的昆明电信工人运动

.....刘运瑞、陈达臣、段铠、黄河清（129）

康宁书店

.....孙晓芬、孙晓云、孙晓静（142）

昆明康宁书店的一些情况

.....李万福（151）

到“山那边”去

.....李天祐（157）

滇桂边区公学

.....胡兴义（164）

思六风云

.....雷澌波（172）

我参加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反蒋武装斗争的回忆

.....张天禄（193）

对张天禄《我参加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反蒋武装  
斗争的回忆》一文的几点补正

.....马仲明（209）

对杨一波《二十年代的回忆及一九三〇年回滇  
经过一文》的补正

.....汪颖清（212）

# 云南“五四”运动回忆纪要

杨一波

## 一、运动的发生

当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在巴黎召开了帝国主义各协约国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中国是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国，会议上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特权，竟被帝国主义国家代表蛮横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而北洋政府出席会议的代表，却软弱无力的承受下来。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首先是敏感的北京爱国学生，在当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等口号。部份群众还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章宗祥的住宅。殴打了章宗祥。这是一次空前伟大的政治运动，它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市民举行罢课、罢市、游行、通电，发挥了极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当时昆明学生在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积极响应。首先由省立一中、成德中学、省师、工校等组织云南学生后援会，定期在省体育场集中，约有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向市民普遍宣传，并发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向北京政府提出收复主权，严惩卖国贼的要求，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运动遍及全省各中小城市。我那时还在省立一中上学，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若干宣传队，深入到市民和郊区农村，唤起群众关心国家大

事，爱国人人有份。记得北京、上海及留日学生还选派代表回滇，沟通省内外运动情况，出版和发行了若干宣传品和小册子，当时还没有《云南日报》、《正义报》，其中有留日归国学生如张天放同志等在昆明出版了《爱国日报》，以贯彻运动的精神。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全国规模的伟大群众政治运动，即在学生工人推动下，把全国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最广泛的群众都卷入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它继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起着伟大作用。

## 二、运动的发展和转变

当时我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六十年前，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极其黑暗的生活，无一点民主权利，守旧、复古传统，更窒息人们的思想。“五四”既带有反帝反封建双重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冲破这种樊笼，于是，适应社会要求发展的“五四”运动逐步转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首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里正确地作出了科学地概括，“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了伟大功劳。它是为了击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胜利前进的。为了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而胜利前进的。这革命深入到上层领域和思想意识范围了。

记得昆明也迅速卷入新文化激流中。首先，中等学校新从北京回来一批教师，他们带回了五四爱国运动后的某些新精神，他们敢于讲俄国劳工革命的新形势，反对吃人礼教，提倡婚姻自由，提倡今文合一的白话文，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正缺少这两种东西。其次，推广新文化书刊，当时全国最流行的有《新青年》、《中国青年》、《新潮》、《响导》及其他新出版物。当时昆明新亚书店，代销的新书刊，极受欢迎，所起影响也大。再次，学生思想极为活跃，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及兴办刊物等如雨后春笋，马列主义也渐为人们所接触和认识，因而发生了争论，并传播了新思想，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为传播马列主义，开辟了道路。也为一九二一年党的诞生打下了思想基础。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周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和胜利发展，人们已经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二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的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上来，这和“五四”时期，条件已大不相同，必须掌握大方向，发扬“五四”精神。把生产科研搞上去，教育与科学搞上去，我们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一切力量。瞻望光明远景，我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动员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到一个目标，我们的任务是一定会完成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于北京

# 回忆“五四”

杨春洲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广大知识青年开始觉醒，走在全国人民前头，用行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英勇斗争的开端，也是新文化运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进攻的开始。它的威力之猛，影响全国人民之深，是空前无比的。

我那时十六岁，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一年级上学（当时的学制，师范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仅就我个人受影响，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例证，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五四运动”前，我这个十六岁的青年学生所看到的云南社会，我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的所谓理想，大致如下：

## 一、我看到的云南社会

在云南，那时是军阀唐继尧统治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色彩十分突出。

法帝国主义在云南的影响最显著。法国人控制着滇越铁路。云南人民亲身经受帝国主义的种种凌辱。火车上，法国人和被他们收买的那些越南人，在检查车票时如狼似虎，大声吆喝，大声辱骂，随手打人。云南人民义愤填膺，却敢怒而不敢言。迤南各县如建水、石屏等地，经常可以看到法国人登踏着跪在地上的越南奴仆的脊背，跃上骏马，扬鞭急驰，越南奴仆还要赶快由地上爬起，跑到马前奔跑，作为飞马的响导。这种

现象，激发着青年们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唤起了誓死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

昆明及蒙自等地都有“洋行”。如哥卢士洋行，若利马洋行，宝田洋行……贩卖各种洋货。国产工业品甚少，本省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当时社会上对一切工业品全冠上一个“洋”字，如洋钉、洋火（火柴）、洋伞、洋布、洋油（灯用煤油）……。城市乃至农村，到处可以见到日本仁丹胡子的广告。以唐继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则对帝国主义者的横行霸道，熟视无睹，对劳动人民则耀武扬威，残酷剥削，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贪污腐化的糜烂生活。中上层阶级，家家吸吃鸦片，储婢纳妾。社会上娼妓、乞丐、赌博、土匪司空见惯。士大夫阶层中，即使有少数开明人士，也只是自命清高，不过问政治，不关心人民疾苦，吟风弄月，陶醉于古文、书画，厚古薄今。孔家哲学则是主宰着人民生活的规范。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认为是天经地义。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五四运动”前昆明曾有一次轰动全城的所谓大事，即女子师范有一女生，她的父母包办的未婚夫是讲武堂（云南的军官学校）学生，因病去世。这位女同学即宣布她要守节终身，未婚夫出殡那天，她在棺后披麻带孝，痛哭流涕，轰动全城。学校当局及政府对她明令嘉奖，誉为节女，“留芳百世”。

## 二、我个人所受的教育

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当时云南社会是首屈一指的名牌学校。每次投考学生超过两千人，仅录取60名，即100名中只取录三名。为什么这样难考？因为他是全公费，供食、供住、供穿，连书籍笔记本都供给。说明当时云南人民经济十分穷

困，能自费升学的青年为数不多，大多数青年升学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师范学校。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学校当然也是染上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考取师范不容易，但考取以后的学习，根本谈不上向科学进军。学校的方针政策旨在培养封建奴才。正因为是名牌学校，这方面的措施更严厉。尽管学校里有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尽管也有英语课程，但教学极不正常。一般说教师水平还是高的，如陈一得先生教我们数学，郑崇贤先生教我们化学，龚自知先生教我们英文……，他们都是学有专长，认真负责。但当时的风气以为数、理、化及英文学好了也没什么用处，上师范是谋取资格，只要把国文学好了，能写文章，能做公文，能写应酬书笺，毕业后既有资格，又有“才能”，就能就业甚至飞黄腾达。师范的校规本来很严。但唯独在学科考试上不严。学期末考试，可以要求教师“指范围”，只考一学期全都所学的一小部份，可以打夹带，可以互相抄袭。平时不用功，考起试来仍及格，甚至可以考得七、八十分。

国文课程，大家是重视的。我们的两位国文教师袁蕩耕先生和庆松泉先生学问都很渊博，尤其袁蕩耕先生，对《文心雕龙》背诵如流。我们仅仅省师本科一年级，他就以《文心雕龙》做教材。据说北京大学也要到四年级才选习这门课程。袁庆二位老师一贯厚古薄今，不但看不起白话文，甚至明清以来的文字他们也看不起。象我这样十几岁的青年，在他们的教诲下，也好高骛远，普通文字都写不通，却眼高手低，崇拜古文。

### 三、我的所谓的理想

青年人不能说没有理想，但由于时代的影响，“五四运动”前，我的理想是可笑的。

省师有历史课，近代史给我的启示较深。读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章节，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种种欺凌，以及清政府的卖国无能。又亲眼看到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弱小民族，我的幼稚的心灵里是有些忧国疾世之感，有一定的爱国热情。但另一方面，旧教育却在腐蚀我，“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逐渐滋长。我考取师范，就以为比那些没有考上的人“高一等”。我学国文追求能写出好文章，也爱学写字，希望能写出一手好字，说不定能更上一层楼，将来会得到一官半职。“五四”前我的理想，基本如此。

#### “五四”的怒潮，冲击到云南

“五四”的怒潮冲击到云南，云南的知识青年象从迷梦中惊醒过来。我们知道一九一七年世界大战结束，不可一世的德帝国主义战败了，参战的协约国在巴黎开会。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约》，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既得利益，竟无耻地接受！北京学生就在五月四日这天，奋勇战斗，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坚决反对《二十一条约》！并痛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全国学生，全国工人，纷纷响应。各省罢课、罢市，坚决要求废黜《二十一条约》，严惩卖国贼！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及抵制日货。

这一自发的爱国运动，逐渐形成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

的群众运动。各校学生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如省立第一中学的杨兰春（现名杨青田），柯维翰（现名柯仲平），尧宗贤、省立第一师范的杨可大、省立女子师范的丁月秋、陆秀贞（现名陆晶清）、商娥生、省立工校的李靖、段擢科（现名段雄飞），省立农校的蒋子孝，法政学校的欧阳策等等，都是当时从学生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积极份子，他们都有才华，为群众所信赖。由于他们代表各校组成全省学生会，公推杨兰春为学生会会长。运动越来越轰轰烈烈，越深入各阶层。在罢课期间，学生们的活动十分频繁。天天出街作宣传演讲，查抄日货。不久商人的日货被没收销毁。这里有个插曲：我们的英文老师龚自知先生，头上戴着一顶日本龙须草帽，走到正义路三牌坊，正碰上检查日货的学生。学生走上前去，说声“龚老师，你戴的草帽是日本货”！。龚老师即取下递给学生，学生接过来扔在地上，一脚踏烂。龚老师并不生气，微笑点头，表示同情。那时的龚老师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教我们班英文比较负责。同学中有四、五人英文程度较好，龚主动把学生分为两组，程度好的高级组教迈尔通史，程度一般的低级组教普通读本。

演话剧在“五四运动”中也是一个新鲜的事，当时不叫话剧而叫文明新戏，剧本内容多半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英勇斗争的爱国故事，剧本的来源则由北京、上海等地寄来，也有由同学们自编的。当时虽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封建礼教；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道德，仍然根深蒂固，不能男女合演。男生演的戏，女角就只有男扮女妆；女生演的戏，就只有女扮男妆。回想起来，形像十分滑稽可笑。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步书刊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大量涌到昆明。土主庙街（即现在武成路）的新亚书局便是专门出

售新书刊的书铺。《新青年》、《新潮》、《新教育》……，这些进步杂志一到就销售一空。云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附庸于这个制度的各级学校，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青年们逐渐开阔了眼界，对现状越来越不满。那些卫道的校长、教师、学监等，感到日子不好过，也在力图抗拒和镇压。

通过这些进步书刊的宣传和教育，青年学生逐渐认清楚，要救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国家才有希望。当时学生中都在嚷要德先生（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先生（赛因士 Science）来救国。虽然对民主和科学的正确涵义还一知半解，但对孔子的奴隶哲学已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反对军阀暴政，反对家长专制，反对男尊女卑，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这些都逐步付诸行动。

当时也听说俄国在列宁领导下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工政府，亦即苏维埃政府。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地主资本家已统统被打倒。所以在学生界中也听到“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恰恰在这时，听说北京有组织学生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办法，半天做工，半天读书，以做工收入，作生活费及学费。这个办法对家庭经济不好的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惜昆明没有人来组织，也不知应如何进行。当时我有一个错误想法，以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能到北京，也可能“勤工俭学”。却没有想到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工业极不发达。产业工人，一方面需要量小，一方面工人待遇极为低微。即使当上工人，也不可能做到半天工作的收入既能养活自己，又能读半天书。那时我不理解这些，一九一九年我父亲病故，家里没有钱供我到北京上学，我暗中筹得路费，就冒冒失失地跑到北京，想去参加“勤工俭学”。幸而在北京废寝忘食地补

习了将近一年的功课，考取了公费的北京师范，使我能继续求学。北师毕业，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又是公费。我是一个寒苦学生，而能读上大学，实为“五四运动”之赐。

“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莫过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难理解，文言文艰涩难懂，广大劳动人民难以掌握，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是阻碍文化传播的拦路虎。白话文则与口语一致，易学易懂。要使中国文化普及，要提高中国文化，非提倡白话文不可。然而历史的阻力是何等地顽固啊？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亦如维护孔子哲学一样，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明枪暗箭，顽固地向新文化进攻，所以“五四运动”只是反封建和新文化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运动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一年党的诞生，延续到党领导中国艰苦奋斗将近三十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才算是获得基本胜利。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又来一个政治上、文化上反革命回潮。今天，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虽已基本肃清，“五四运动”已满六十周年，我们还要发扬“五四”战斗精神，才能使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将祖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回忆五四运动的感悟

陈可轩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政治上没有压迫，经济上没有剥削，消灭阶级，平等自由，北京各大学生传开新闻，都发生欣羨如司马迁的“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思想，萃于内心也久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军正式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各国在巴黎商议和约。我国派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等参与会议。在大战期间，日本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向我国施加压力，强迫我们承认他提出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它料到卖国贼袁世凯一心一意恢复帝制，可能接受，而我国人民不愿做奴隶，一致愤恨，有不惜一战的决心，但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忍辱屈服。亲日派交通部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輿为了北京卖国政府的利益，向日借债，把许多权利送给日本，作借款担保品。那时日本出兵占据了德国租借我国的山东胶州湾并建筑胶济铁路，大有把山东永久霸占的趋势，曹、章、陆这些人已受日本贿赂，不惜一切，同日本狼狈为奸。我国爱国人士无不痛心！在巴黎和会上，我国代表提出要从德国直接收回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主权，请各国代表主

持公道，取消日本要挟我们的二十一条协约。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各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我国代表不肯签，二日由无线电传达这个消息，我国人民闻之，无不怒发冲冠。五月三日北京各大学学生开会讨论决定四日下午二时聚集天安门广场，到齐后约有二千九百人，开会说明今天的游行的重要意义毕，即出发了，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路线先从东走，穿过东交民洛园公使所在处，殊不料到了巷门口，卫兵把守，架上机枪，如临大敌，不许通过，交涉无效，只好转向北行至赵家楼曹汝霖门前，见门紧闭，同学中有的爬上窗台将格子打断进去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而进，遇物毁掉，曹汝霖由后门逃去，无意中遇到章宗祥往曹宅，但未清楚他是卖国贼中的要人，痛打一顿而已！假如知道他就是章贼，非打死不可，此后将房烧起火来，烟雾发作，四面警察、宪兵来围捕，同学大半散去，只有几十个人为走狗的警宪捕去，至夜未归，次日罢课抗议。此次的运动是革命行动，传遍各省教育界全体继续罢课，工商界也罢工罢市。北京卖国政府，不得已将捕去的同学完全放回，罢免曹、陆、章三贼的职务，以平民愤。

我校北京高等学校（即今北师大）被捕的有七人，只记得有同年级史地部熊罗飞。他们被扣留了约一周。放回时，同学们到门口，将他们七人举起来，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风闻北京各大学在五四运动被捕去的学生中，仅北大一校，约三十多人，其余不甚清楚。同学等放回之后，提前一月放暑假，该毕业的，也提前一月毕业了。

我们不答应巴黎和约，影响各国，引起了美国国会不批准和约，最后日本人不得不退还青岛给我们。我国各地产生学生联合会，政府愈加难以约束了。

为回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满六十年，只少六个月了。我亲身参加了最光荣的革命行动，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但有最顽固透顶的云南教育厅长秦光玉认为我革命有罪，目为宣传五四运动，将来制造风潮的祸根子。在毕业前，汇来旅费，令我回滇。旅京学会，委托我到滇后宣传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真实情况。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那能不履行？到了昆明，法政学校聘我任附设英语专修班国文教员和省立一师二部师范逻辑学教员，在两校初次上课，点名毕，学生即问我北京五四运动的一切情况，正合我意，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学生非常满意，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秦光玉对我不放心，在堂外偷听，他对我的不放心，是早有由来的。我在一九一四年考入北高师，当时云南每月津贴六元补助，不料到我，即停发了；于是我请求云南教育厅照例发给，回示不准。我再请求，则使我向隅似乎不宜。当时李印泉（名李根源、腾冲人）李子旭（曰垓、腾冲人）杨迺震（名琼、邓川人）三位先生在北京住在一处，他们是议员，星期日去拜访，问我省情况，我顺便谈云南教育厅截止津贴事，李印老说：这太见小了！我替你写信给唐蓼虞都督令教育厅恢复你的津贴。隔一周多，教育厅致信学校挂牌申斥我，才过一日，接得恢复津贴款汇到，并回信。从此他疑我斗争性强，爱出风头，好闹风潮的人。年假我回丽江市亲，接信辞退省一师教师职，一时莫明其妙。一九一二年十月云南教育厅宣布送留美学生六名，资格大学毕业后任教本省二年以上，考试国文英文专科，应考有张鸿翼、袁丕佑、郑重魁和我四人，发榜只取三名，独我名落孙山之外。那时我住省一中任十三班国文教员，该班学生，闻此事件，大为不平，自动联络一中全体学生罢课抗议（现在周从唐〈字未书〉可作证）。校

长丁绩反映教育厅，秦光玉说：因留我委任丽江六所联合中学校长，所以不取。我考留美学生，不考校长，岂不是咄咄怪事么？狐埋狐掘，正是这样么？

文史馆员陈可轩

1978年12月6日

# 民族英雄项崇周传略

胡兴义

项崇周，苗族，清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生于云南省西畴县摩洒锅底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项正清，是个老实巴脚，勤劳朴实的庄稼汉，母亲终年埋头劳动生产，是个善良的普通农妇。崇周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人们叫他“年四”。

“年”是大名，“四”是小名。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前后，他家搬迁到扣林山脚的猛洞村定居，仍以农为业。

崇周自幼聪明胆大，喜欢舞拳弄棒，经常跟随父亲到山上去打猎，练出了一身武艺。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力大过人，能把一百多公斤重的巨石，脸不红，气不喘的抱着走上十步，丈把高的墙壁，他也能一跃而过。就在这段时间，他在野猪塘打死了一只危害人畜安全的老虎，为地方上除了一害，获得周围数十里群众的交口赞誉，把他称为“活武松”。

董奔地区的苗王熊天主，爱崇周年青勇猛、胆大机灵，把他叫去当了贴身侍从，还叫自己的武术教师马飞天传授崇周武艺。

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法帝国主义占领越南后，又把魔爪伸入麻栗坡、马关一带，这时崇周已回到猛洞当了“寨老”（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为了驱赶法国鬼子，保护家乡安宁，于是邀约了他的十七个郎舅弟兄和猛洞一带的爱国群众，聚会在一起饮鸡血酒，发誓同心协力，卫国安民，接着，他就